

计划经济：魔鬼？还是未来——答一位知乎上的朋友

作者：（知乎）天王云国度

自从开通知乎之后，有许多朋友为我的回答和文章点赞，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关注我，对此我要表达自己由衷的谢意，在知乎我能同大家交流一些想法，也从大家那里学到了许多。在很早以前，我的文章下面收到了一位朋友的评论：

“作为一名右派保守主义者，我一直觉得民主还是集权，他们之间的事非曲折完全不重要，左派对于经济的影响，显然是我成为一名右派的主要原因，左派所提倡的国有化，高福利，我完全不能接受提倡国有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交易的对象往往被过分忽视，以苏联为例，到最后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差相貌又丑，就是忽略了消费者的选择方式，计划经济又无法对每个人的消费需求作出估算，导致产品往往令人堪忧，再看看现在左派政党的行为，为了维护高福利，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于资本，市场完全进行的一种堪称恶劣的迫害，底层人民是开心了，可是谁为高福利买单，政府为了获得支持，不断许诺，最后又因为经济缺乏活力，无法兑现，委内瑞拉不就是极好的例子吗？而我们右派，保守主义倡导的是人人靠奋斗，试想，人人天赋上的差距，怎么可能平等呢？这样的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经济能不发展吗？保守主义者不同于左派，往往强调

稳定增长，左派分子甚至不惜用革命推翻一切，法国大革命不就是这个例子吗，在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所以我个人所见，左派的一些政策，实在是不合理。”

朋友，我非常愿意就这个问题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因为这番话其实在知乎上很有代表性。不过在这之前首先我希望能打消你的一个误解：**不是任何自诩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左派。**有的人不能把握住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他们看不见**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两个是社会主义成立的前提**，却往往把“国有化”“高福利”“贸易保护主义”这些一鳞半爪当做是判断左派的标准。查韦斯和他的继任者马杜罗一不消灭剥削经济，二不提阶级斗争，他们所主张的“21 世纪新社会主义”只是变着法拿石油换钱、换商品，如此坐吃山空，又怎能怨左派？还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左翼”之类的杂牌军，对选民吹下天大的牛皮，然后再从组阁里捞个一官半职，“左翼”新政满面春风，结果企业家、银行家一不高兴，是贷款贷款借不来，改革改革做不成，牛皮告吹，选民把他们轰下台。更别提政治强人如俾斯麦、希特勒，用国有化、国营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开道，辅之以一星半点残渣抛给工人，以为如此便可稳坐江山，却没想到通货膨胀、债台高筑，要么重新私有化，要么侵略别国转移矛盾，终究难逃一败涂地的下场。恩格斯讽刺道：“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1]他们的失败早已证明：**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与经济制度，无产阶级的诉求才能真**

正得到伸张，否则靠选举游戏、靠小修小补，只能落得黔驴技穷，惨淡收场。

弄清楚你反对的是什么、支持的是什么，交流才能继续下去，不是吗？

你提到因为计划经济，苏联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差象貌又丑”，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计划经济的东西不如市场经济的好，所以计划经济是不好的”。很明显，**你是在用感性体验来判断一个事物**，许多人就是用这样一种感性体验去描述他们眼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行政指令、官僚腐败、干涉经济、“大锅饭养懒汉”、封闭僵化、效率低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透明开放、灵活调节、积极进取、富有创新、配置高效*。这并不是说感性就一定不好，其实我们不妨从这个现象入手，再深挖一下，看看计划经济生产的产品和市场经济比起来到底为什么“质量又差象貌又丑”。

实行不同经济体制国家间的先天差距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原因。最发达的美国至今有 200 多年的历史，期间只爆发过一次内战，即使冷战时期它与苏联也仅在远离本土的阿拉斯加处对峙，长期和平的国内环境使美国有充足的时间发展民用工业，也孕育了能让美国产品横扫世界的美元霸权。与美国不同，苏联从成立到解体总共才 69 年，她出生时各帝国主义环伺，没有西方那样雄厚的工业底子，也没有任何殖民地去搜刮原材料和输出商品（国体也不允许），如何保证政权存在就成了苏联工业的首要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世界反法西斯

斯战争结束后，苏联除了在东方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日本、韩国，还要在西方领导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老欧洲直接对抗。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苏联要生产一部 iPhone X，想都不要想。但在短短 69 年里，苏联还是在这个世界留下她不可磨灭的一笔，她在初期战胜了种种内忧外患，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同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如此艰难环境下苏联仍然设立了一整套国民保障体系，那么计划经济是落后，还是先进呢？

市场经济不乏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是以 iPhone X 为例，一部 iPhone XR (64GB 版) 在中国售价 **6499** 元，据信每部 iPhone XR (64GB 版) 部件成本总共 **1665** 元左右。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部手机的组装工本更是不值一提。根据@蓝军战情室一篇 9 月的文章^[2]显示：富士康郑州园区每条产线配备 **1200** 名工人，每条产线每小时生产 **590** 台手机。如果我们按照以往富士康郑州园区每月加班 **60** 工时以上^[3]，并假设普工平均月工资为 **4200** 元，那么我们最后得出的工本也顶多 **29** 元/部，如果里面有临时工、童工，平均工资再低一下下，那可能连一半都到不了。就算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只要苹果公司愿意大发慈悲，相信你一个月的工资还是可以买一部玩玩的。



“富士康”是台湾鸿海科技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叫法。富士康员工真实的工作状况根本没有文章假设的那样美好，有报道称他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月工资才不到 3000。高强度的工作环境直接导致 2010 年深圳的“富士康十四连跳”惨案。

如果不喜欢苹果，你可以选华为、选三星，不过对于苹果公司而言，手机市场终究是有限的，要争夺有限的市场，获得最大总利润，那就得做两件事：

① 尽可能生产出填满全部或部分需求客户市场的商品

量；

② 进一步压缩手机成本，价格更低、利润更高，更加“物美价廉”，最终将华为、三星这些竞争对手从你心里通通排挤出去。

无论是实现①还是实现②，苹果要做的还是两件事：

I. 降低用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原材料是工人采集的，归根结底还是用工成本）；

II. 减少生产的劳动时间（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同自然斗争的共同之处）。

前者的代表就是刚才讲到的“血汗工厂”富士康，后者则是兴起于信息革命的科技企业苹果公司。后者貌似比前者更进步、更文明，可是这个过程并不像《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讲的那样优哉游哉^[4]，**技术革新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最终还是要靠削减用工成本实现**。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容量不变，掌握新技术的苹果会倾向于裁掉一些工人节省成本，技术落后的手机企业直接倒闭，所有职工失业流回劳动力市场，而供过于需的状态会使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压低，为苹果进一步节省了成本。

问题在于，**从宏观上看，企业商品销售的对象，同时也是它们支付工资的对象，工人工资降低甚至失业，社会总消费能力就会下降**，假如苹果看不到其中的根源，缩小生产规模，加大减薪、裁员力度，那么就会诱发如下循环：

技术进步→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减薪、裁员→总消费能力下降→商品滞销→减薪、裁员→总消费能力下降→商品滞销→减薪、裁员→总消费能力下降→商品滞销.....经济崩溃。

到那时，不管多物美价廉的手机，苹果也卖不出去，大家也买不起了——别说手机，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该认识到：那挂满霓虹灯的摩天大厦，那超市里堆积如山的货物，它们光鲜亮丽，但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们。

“市场终究是有限的”，这句话等于承认市场经济下供给的商品最终会超过社会总的消费能力，上述①② I II策略不仅苹果在执行，华为、三星同样在执行，竞争者们不约而同地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去生产社会根本消化不完的东西上，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的同时，也在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大家都知道制造智能手机离不开一种原材料叫稀土，然而稀土开采遗留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严重破坏地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酸化，使得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高浓度氨氮废水、放射性废渣等污染物”“造成山体滑坡、河道堵塞、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5]。鉴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规范、限制稀土开采和贸易。美国、日本等国对中国的稀土政策很不满意，它们不是不清楚稀土开采带来的恶劣影响，进口这种稀缺的原材料也不是首先用于超级计算机等尖端设备，而是制造电子产品返销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赚剪刀差，即便如此，这些发达国家还是要求中国放开稀土出口配额，并以各种手段不断向中国施压。同样遭受觊觎的还有中东的石油、南美的硬木、非洲的狮子和大象等等等等，掠夺式开发造就了每年上千万吨石油污染海洋，亚马逊雨林面积骤缩 50%，灭绝的动植物不计其数。资本主义正在对地球进行毁灭性的破坏，资本家却要把自己的短视推到人性贪婪头上，殊不知许多人根本买不起车，买不起实

木家具，更买不起狮皮壁挂和牙雕，在这件事上全人类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一起遭殃。

这才是市场经济真正的“无形的手”。

“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秘诀在于，自由竞争能够发展优秀的产能，淘汰掉落后的产能，这是计划经济永远不能比的。”他们似乎忘了，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不是上帝，利润才是上帝，为了利润，资本家经常干着“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好事。遇上利润高的产业，比如说房地产、医疗、教育，资本家就蜂拥而上；而一旦是利润低下的，比如钢铁、重机械、农业，资本家又会急忙撤资，已经卖不出去的商品，即使就地销毁维持物价，也不会送给（哪怕是贷给）真正有需要的人，由于没有赚头而生意惨淡的行业也就成了“落后产能”，资源自然也“优化配置”了。更有甚者，为了发财会偷工减料、坑蒙拐骗，损害消费者权益。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各色山寨品这些就不说了，三星的手机会爆炸、葛兰素史克为哄抬药价四处贿赂、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检测上弄虚作假，但是三星依然是韩国头等大财阀、葛兰素史克依然能够在中国招摇过市、大众依然是世界汽车巨头，无论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这些企业只要自罚三杯，照样坐拥天下。相反，许多中小企业破产不是因为他们产品不好、经营不善，只是因为实力上无法抵抗以上这些巨头的排挤罢了。试问这时候，用普遍贫穷和环境恶化换来的“优胜劣汰”又上哪儿去了？**“利润，而不是需求”，自由市场主义者抛弃了如此简单的**

原理，硬是要把资本逐利跟社会需求拉郎配，不厌其烦地论证市场经济的精妙与博爱，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与之相对的，计划经济的产品又何来“质量又差象貌又丑”？最起码几乎没听说有为了赚钱偷工减料或是危害使用者的，没有添加有害物质的食品、质量有保障的日用品，要远比在多彩缤纷的市场经济生活安心得多。况且，正是有了计划经济的遗产，今日的中国才得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大白兔奶糖、青岛啤酒、云南白药、百雀羚“小蓝盒”、英雄钢笔，有的中国品牌要比新中国更年长，但它们能够发扬光大甚至远销海外，得益于建国初的经济体制；至于汽车、航空器、机床、石油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更是推行五年计划以后才有的。所谓“到最后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差象貌又丑”，无非是脱离两个不同社会的现实考察，拿资本主义的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有因为苏联电视机不能和日本红白机完美兼容，骂苏联垃圾的；但你啥时候因为 iOS 不能兼容安卓软件，骂苹果垃圾的？**两种制度在各自产品上折射出的理念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提。**冷战开始时西方国家就设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贸易封锁，后者只能自己去探索和追赶，这依旧取得了成绩，不单单是中国，苏联的伏尔加轿车、LOMO 照相机、博尔若米苏打矿泉水，东德的卫星轿车、前进农机、小红帽香槟，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汽车，以上放在几十年前都是明星级品牌，如能假以时日，东风必定压倒西风。



奥克塔瓦 TM2 耳机、基辅 30 便携相机、伏尔加嘎斯 24 小轿车、AK-47 突击步枪……做工精良的苏联产品有很多，现在看起来依旧很前卫，可惜如今都被一句“质量又差象貌又丑”给轻描淡写地埋没了。

有人可能嗤笑道：“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你说了那么多，苏联不还是玩完了？无论制造的产品多么好、经济上多么卓有成效，计划经济依靠行政指令办事，就是违背价值规律，就会导致绝对腐败！”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一个 X 远优于试图探求这个未知数的解，对这个 X 的一切崇拜源于“看不见的手”，对它的了解也止步于宗教式的崇拜了，他们眼中的自由市场是一个黑箱，内部构造讳莫如深却能神奇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也好，我们在这里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既然

前面已经透过产品现象简单分析了市场经济两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接下来我们就用比较的眼光来看看计划经济的内部运行与长短板。

看过日剧《半泽直树》的朋友们都知道，第一季第一集的背景就是：东京中央银行有一个融资 100 亿日元的业务指标，大阪西分行达成会得到嘉奖，对分行的职员审评也有利。要知道金融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血液，如此重要的部门靠指标办事，这不正是为你们右派所诟病么？有人说了：奖励和惩罚不一样。我要问：能找出一个公司奖惩办法（是实际运行的，而不是用来糊弄社会 and 法律的）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管理体制（符合马列主义定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吗？如果限于条件找不到，我是不是可以回答：在生产资料固定的情况下，多分给某个分部，和少分给其他分部，仅仅是换了种表达方式？**人从茹毛饮血走到今天，要集体生产，就离不开劳动力的组织方式，也就离不开行政**，一个公司在生产商品前要调研市场、讨论决策、调整预算、设计产品、调度资本，最后商品从流水线流入市场，这才构成了“无形的手”的全貌。计划经济也要搞调研、调研完了也要讨论、讨论完了也要制订新的国民计划、设计局也要干活、也要从全国范围调动物资，世界前五百强企业，他们的规章制度、他们的管理模式加起来，我看不见得能比全国规模和跨部门的实践经验更系统、更科学。计划经济有指标，私有企业也有指标；计划经济的执行者有损公肥私的，私有企业里的家族式管理更甚；计划经济是不是真的“养懒汉”尚未可知，“磨洋工”可是私企一绝.....如果只是谈管理科学，那么计划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市场经济自己同样无法解答。

西方经济学的课本上写着：“追求效率促使人们更好地劳动，追求效率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事实上，正因为利润的存在，许多专门的信息咨询公司应运而生，它们通过贩卖情报牟取暴利；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要先同加工商展开利益博弈，谈判期结束后生产环节才能继续进行；即便如此，中间各部门资本家所赚取的利润最终要施加在消费者头上，摞得层层叠叠的价格，难免让消费者望而生畏。而且，价格低于一定期望时，卖方会选择囤积不卖；价格高于一定期望时，买方又会选择持币观望——经济前景越悲观，僵持局面越容易出现，危机持续时间也就越长，所谓的价格杠杆根本不起作用。劳方与资方、供应部门与加工部门、买方与卖方，本该纳入宏观经济学考虑的一对对组合在现实里互为壁垒，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反而延缓了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一体化。**

现在明白了：某些人引以为豪的“价值规律”不过是市场经济自己的颠簸，它不能直接改进生产，只决定利益分配，引发波动的不是自然因素，不是除它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如果大众推出一款以“虽然上下震动但不至于太厉害”为卖点的车型去卖，那它就不光是罚 180 亿美元那样简单，怕是要彻底从汽车市场滚蛋了。

“对于资本，市场完全进行的一种堪称恶劣的迫害”！没错！这种迫害（专政）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也跟着消灭了利润这个壁垒。**生产资料因为公有化畅通无阻地流通到需要的地方，在全国一盘棋的部署下，经济数据获取更加便捷，内容也更加

全面和详实；中央依照国民需求的发展配置不同行业的生产资料，不会如市场经济那样“晴天送伞，雨天收伞”；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互通有无用不着勾心斗角，直接划拨物资，商品没有掺杂利润，价格会很低廉；国家不会滥发纸币，没有通货膨胀，劳动者手中的劳动所得也就不会凭空蒸发；国家掌握了人口、国民生活水平、各部门生产情况，根据这类信息合理调整下个经济计划各生产部门比例，制定并执行国民就业、生产、流通和消费预算，满足国民基本需求，丰富国民高层次需求。物价稳定、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没有雇佣制也没有大规模失业，就不会出现市场经济那样的颠簸，生产者不需要考虑利润，只需全心全意缩短劳动时间、更好满足国民需求，也不会弄虚作假，因为产品终究还要自己用，生产与消费被统一了起来。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看起来虽然缺乏色彩，但安居乐业，几块钱往往能买下一大堆东西。

至于“忽略了消费者的选择方式”“无法对每个人的消费需求作出估算”，问题远没有你想的那样严重。在实践中，中央不会盯住每一处生产单位不放，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经济计划有长期、中期、短期，计划参与者涉及中央、各级地方直至全体基层劳动者，中央根据基层、地方的汇报决定长远的、全局性的计划；各级地方负责统筹全国和局部的关系，既要完成指标又要因地制宜；基层生产单位补充细节并具体执行。这里要指出的是，基层补充的细节绝不是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相反一个经济计划只有经过基层劳动者研究才能贯彻落实乃至超额完成，研究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机器是否适用、原材料的份量是否充足、技术是否可以改进，因为劳动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比旧社会的企

业主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经济计划不需要把需求数据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只需要估计出一个上限然后鼓足干劲去实现，如果产品仍有剩余，那么下个经济计划就可以扣除一部分。^[6]要说到需求，没有什么比对药品的需求更急迫，一剂药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在 1960 年的中国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为了拯救 61 名食物中毒的民工，从县委、省委到中央，从医院、公安局、卫生局到空军，动用了全国力量，将救命的特效药从北京空投到山西平陆，这就是著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当影片《我不是药神》引发强烈反响时，我们不由想起某篇 50 多年前的通讯报道。

我们承认，历史上所实践的计划经济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流通不够及时，没有照顾好群众的需求；比如一个地方的产品反馈信息难以传达给距离遥远的厂方；再比如某个区域内许多部门和团体都向一个厂子提要求，或是要物资，时间紧任务重，却又超出了厂方现有的能力.....

计划经济也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先承认这样一条前提：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公有制。

回想起我刚开始说的：不是任何自诩为“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左派。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这些国企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普通职工、公民无权过问国企的任何事务。“国有化”是帝国主义形成的表现之一，这些国企要么是政府拨款、大资本家参股或加盟，要么政府直接收购不景气的企业，资产阶级不会容许有新的、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存在，所以一旦这些国企不能让资本家满意，政府就会在拨款等方面限制它们的发展（美铁就是一例），到最后还是会通过“改革”扩大私人股份甚至贱卖给资本家。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国企，首要目标是追求利润而非服务人民，企业管理人员都想把公司资产倒卖到市场上大捞一笔，贪污腐败接连不断，职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生产的商品、提供的服务也愈加糟糕。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绝大部分要依赖本国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实现，以纳粹德国的“四年计划”为例，克虏伯、法本、西门子等财阀的头子直接在纳粹的委员会里任职，通过瓜分国家银行和吞并中小企业大发横财；戈林、希姆莱这样的党棍则在两个“四年计划”里成为新贵；当年坚持《二十五点纲领》、坚持没收

土地和大企业为国有的冲锋队派系反而遭到希特勒无情镇压。同样的道理，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各色“左翼”政党只不过充当了资产阶级实质上的白手套，他们大多凭借经济不景气或政治危机上台，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基的情况下推行改良，这才有了你说的“国有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高福利”，等到风头一过，“国有化”不见成效，“贸易保护主义”阻碍资本流通，“高福利”难以为继时，有的“左翼”就会失去执政地位，另一批则改头换面，政策与保守派无异，无论如何他们都将失去群众基础。



冲锋队头子罗姆与希特勒在一起。希特勒的上台离不开冲锋队为他卖命，冲锋队主要成分是小资产阶级，激进的他们主张针对地主和大资本家实行“二次革命”，但这很明显触动了容克出身的国防军的利益。最终希特勒选择站在统治阶级一边，授意爪牙发动“长刀之夜”血洗冲锋队，罗姆在这次行动中被秘密处决。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不一样，公有制企业受工人和其他群众的监督，管理者不敢公然以权谋私。因为没有市场，即便有人贪污公产，他也无法顺利倒手兑现，还要面临被检举的风险。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保障不是福利，即不是国家用来施舍、收买和缓解危机的小恩小惠，它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是劳动者应得的待遇，只不过这种待遇无法用货币代替，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自然也不存在你所说的福利难题。有人声称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唯一资本家，国家剥削工人，这有点让人不知所云：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全体劳动者共有，自己是不可能剥削自己的；国家不允许私人持有生产资料，各个工厂、企业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不会独立出现大大小小盘踞其上的利益集团；没有资本，国家拨给企业的信贷只是用于提取生产资料的凭证；没有雇佣制，生产单位不能随意开除工人，劳动者不受失业或失业大军威胁；生产与消费相均衡，如果官僚效仿资本家，占有全部商品却不支付工人能够充分消费全部产品的工资，那么剩余卖不出去的商品非但对官僚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造成社会动荡，此举百害而无一利，完全没理由这样做。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在哪里呢？剥削在哪里呢？拿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统制经济的困境去揣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永远得不出正确结论。如果所谓的“剥削”是指党政干部的工资、待遇，那么此论大可休矣，**阶级社会下人类组织生产都离不开一批专门的脱产人员，他们固然不创造财富，但却无可替代地维护统治阶级占有这些财富，社会主义制度的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在国家消亡、脑体差别消亡前，这样的脱产人员仍有存在的必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搞特权的确存在，特别是政权建立初，但随着人民素养的普遍提高，重视运用手中的民主权利，这类现象将逐渐杜绝。

除非，借助对外经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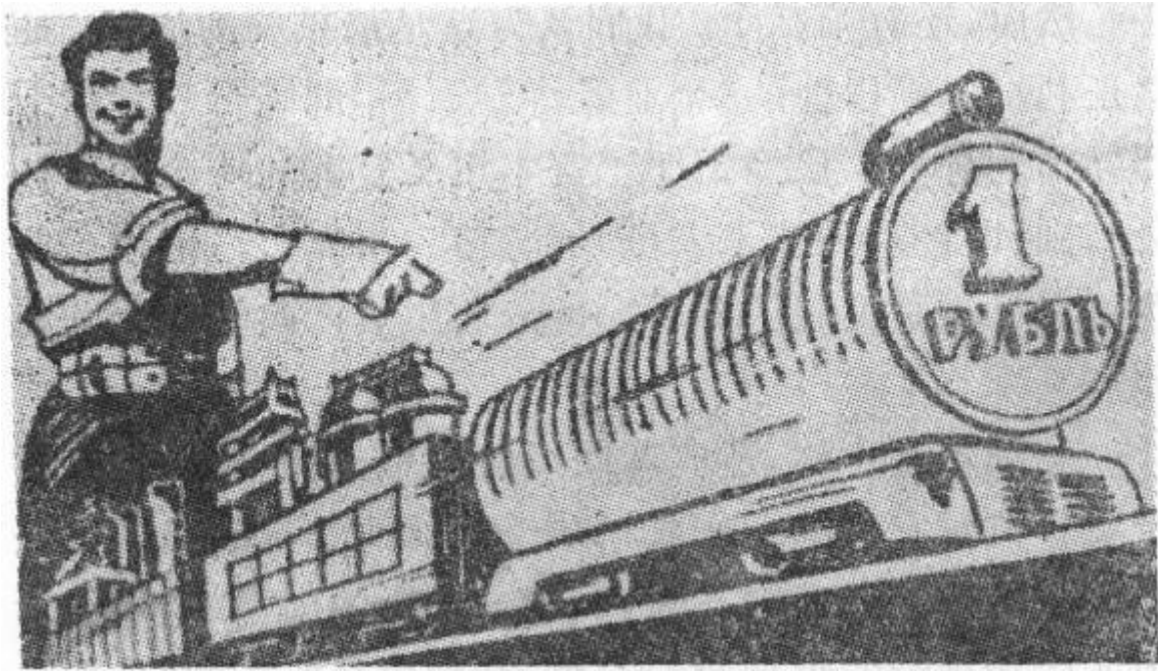
当与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往来时，计划经济国家表现为外观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以赢利为目标组织工人生产商品，与外国进行贸易换取外汇，商品流入外国自由市场。^[7]对外贸易可以消化掉由国家占有的“剩余产品”，商品换取来的外汇不能直接消费，它的价值实现受国际资本主义左右。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察盲区，外贸职务犯罪相比生产、计划这些部门更难被发觉，官僚很容易同海外勾结，用走私、回扣、瞒报等方式贪污受贿，然后把赃款存进海外银行账户，当然也不排除将工人劳动成果直接换取国外消费品、奢侈品供自己享受（我们可以管叫“海外特供”）。在上述过程中，官僚才勉强可以说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感染，方法有三：其一是将外汇尽快兑换成硬通货（如黄金），这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策略；二是尽量减少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接触，转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互助合作，苏联发起的经互会就是一种思路；三是推动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地盘，压缩资本主义地盘，最终在全球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事业。况且除去“海外特供”，上文的“剥削”终究是犯罪，官僚只能秘密地、小规模地进行，也仅限于任期内进行，职务犯罪一旦被告发，官僚的个人前途立马会被宣判死刑，风险与利益（而且还无法正大光明享用）不成正比，和资本主义大老板比就更叫自惭形秽了。此时的官僚与其说是特权阶层，倒更像公交车上小偷小摸的扒手。

所以，官僚们要想攫取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富，就必须对现有制度“修正”“改革”，在此之前要先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思想落后的军政干部（尤其是脱产干部）、工业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有小农思想残余的农民就成了他们首要拉拢的对象。**这一时期修正主义者的政策主要有：“下放权力”，放松中央监管和法律限制，提高官员待遇；削弱生产部门中的政治领导，扩大专家、管理人员权力，用奖金、津贴等形式的“物质刺激”拉大收入差距；过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农业的小生产化（如取消农机站、扩大个人自留地和家畜数量）。修正主义刚起步时会表现出反常的“友善”，甚至不惜透支国家长远发展来迷惑、麻痹工农群众，国民生活质量会有短暂的提高，历览各国修正主义的萌发，概莫能外。

等到官僚集团积蓄起力量后，便着手“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改“政治挂帅”为“利润挂帅”，以利润为指标衡量企业的经营。**要知道，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绝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统一集中上，它根据国民的实际需求组织生产，这样就比市场经济节省大量人力物力，成本高但急需的产品（如药品、化肥）可以按照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而非必需的高档品（如腕表、装饰品）则可以卖价高一些，好用来补贴上一类产品的缺口。肥瘦均衡优化了消费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健康发展，只有俱为一体的公有制经济才会出现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定价。然而，当社会主义经济开始倡导利润时，生产上亲密无间的关系就随之破裂。因为利润挂帅，生产环节上游企业不再团结协作，反而会讹诈下游，后者不得不同前者讨价还价，生产时间拖延，商品价格被抬高；而且企业

也学资本家那样挑肥拣瘦，利润高的多生产，利润低的少生产，结果一部分商品堆积，一部分商品奇缺，国民经济发生紊乱；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造成大量劣质产品流入，群众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黑市买卖开始猖獗。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会利用先前扩大的权力谋私，失去工人监督钳制的他们会私下倒卖货物，甚至开黑工厂；工人可以被任意处罚、克扣工资甚至开除；新技术、新设备迟迟得不到应用，要么是开发方漫天要价，要么是管理人员觉得没有利润；如果还有企业像以前那样目光长远、为人民服务，那它将难逃扼杀，因为国家银行是按照一定期限内盈利率优先分配信贷的。第一产业继续散漫化，更多的生产资料被私分，生产由集体分裂为小组；即便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庄主席/农场经理也和企业高管一样掌握生杀大权，不仅不受约束，还可以随意欺压基层；私人生产的农产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它们被允许拿到自由市场上贩卖，价格畸高且质量良莠不齐。以上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农业不能自给，粮食只能依赖大规模进口，粮食安全岌岌可危。改革的成果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患上资本主义特有的症状，官僚和受惠于官僚集团的“新阶级”从中捞取第一桶金，逐渐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而广大劳动群众则失去了主人地位，沦为被雇佣者。



这幅某苏联杂志上的漫画充分暴露了苏联经济改革的资本主义倾向。

内部改革的同时，修正主义者也会开始“开放”政策，他们很清楚，只有“走向世界”，压榨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到世界市场去，才有更可观的利润赚取。“开放”政策第一个明显特点是短视的市场投机，以1972年的苏联为例，苏联因农业惨淡在世界上抢购大量粮食，拉升了世界粮价，等到第二年收成好转了，便抛售粮食，赚了一笔差价。投机从不考虑人民需求和国家长远利益，哪怕国内紧迫需要某种产品，只要利润够高，官僚也会眼皮不眨地卖掉。官僚不甘止步于商业往来，他们必会将目光投向资本，本国在海外投资建厂，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工人；反过来外国资本家也来本国输出资本，剥削本国工人。“对外贸易垄断”是由列宁首倡的一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铁则，列宁多次指出国家垄断外贸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否则革命将面临内外夹击之虞。但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超额利润，会毅然决然地抛弃这一铁则，正因为外贸垄断松动，他们才能伙同私企甚至是犯罪集团走私倒卖国家财富，或是自

家黑工厂生产的私货。扩张是资本的本质，修正主义必然会引向对外压迫道路，要么逼迫别国与自己确立不平等关系，方便经济掠夺；要么打着“友好援助”的旗号，企图控制被援助国的经济命脉。苏联可以再次为我们佐证这一点：前者，苏联强迫经互会成员国参与所谓的“国际分工”，只许他们生产特定的低端产品，阻碍他们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苏联则趁机剪羊毛，实现经济殖民；后者，苏联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合同、出售军火和设备，但其中附加许多苛刻条件（如只许进口苏联产品、交出资源开采权、执行亲苏政策），如果对方拒绝，苏联就马上撕毁合同或用经济讹诈迫使对方就范。为了自身利益，修正主义大肆开展军备竞赛，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苏联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 年入侵中国、1979 年入侵阿富汗，这些战争完全不能与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阶级解放战争相提并论，它们无一不是为了维护苏联修正主义霸权，故而毛泽东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由社会主义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修正主义者在身份上具有两重性：公开场合他们运用国家机器压榨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产品”卖到国外；私下里则拼命把国有资产塞进个人的小腰包里，为未来变身寡头做准备。诡异的是，他们对于国家同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实现资本扩张，官僚积极推行沙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输出和军事扩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复辟无法在国内独立完成，官僚便向外国资产阶级投怀送抱，充当他们的买办，请他们代销“剩余产品”、拓展市场，乞求

他们提供技术、设备和贷款，对他们开放市场、吸引投资，乃至伙同他们瓜分国有资产，以上两者并不矛盾。

资本主义复辟，是新生资产阶级的狂欢，也是无产阶级的灾难。人民的日子举步维艰，支付不起高昂的生活成本，就业也失去保障；国企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僚作风与日俱增，产品低劣，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私企坑蒙拐骗现象屡禁不止，本分经营的被挤垮，投机取巧者做大做强。然而官僚资产阶级不会承认恶果是他们自己酿成的，反而说这是因为没有“深化”“改革”。所谓“深化”，无非是“三化”：市场化、产业化、私有化。

1. 市场化：国家缩减经济调控职能，资源分配、定价权逐步让渡给市场；国企、国家银行、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放弃社会职能，运营向资本主义靠拢；扩大自由市场规模，各类行业向私人和外国开放；洞开门户，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分工，取消对特定部门的扶持和保护，任其在受国外强势竞争者冲击，自生自灭；允许私人银行存在，开放证券市场，鼓励创办上市股份公司；对外无限度贷款、举债，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接受西方集团提出的“改革”方案；国企大规模裁员，设立劳动力市场，削减、废除工人劳动保障。

2. 产业化：钢铁、重工、交通等行业“向钱看齐”“有水快流”，不根据实际需求过度生产，为追逐利润不顾公众

和职工利益；放开“土地财政”，允许政府在事实上向私人出售、租借土地；教育、医疗、住房，这类过去本应承担人民基本保障、对人民负责的公共部门被全盘营利化——总之，什么都能被拉出来赚钱，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3. 私有化：国企大搞“精英管理”，剥夺工人发言权；通过“联合经营”“引入破产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明晰”“去产能”等方式，将国有资产贱卖甚至白送给私人；在农村，解散集体农庄/公社，推行公开或隐蔽、部分或完全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使生产彻底小农化，并逐步实现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以促成资本下乡。

“深化”改革会给江河日下的局势带来一丝转机吗？长期来看，“国家”这层身份并不能给予官僚资产阶级更多便利，它意味着更多的约束、更多的监督和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也不能像私有财产那样被享有或继承，至于过去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嫉妒不已的强大动员力，也早已土崩瓦解——这个字眼现在不过是影响口感的果皮罢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形态，分家散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到：公家的物资莫名其妙地被某些人倒卖到自由市场上，有人更是创设专门的公司经营这门“业务”；数不清的国企一夜“改制”，要么干脆破产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惊讶地发现，同在一个厂子里的管理干部西装革履，原来后者中饱私囊久矣；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成为社会新常态，这却喂饱了私立教育、私立医院和房地产大亨；进

口品成为新风尚，连同它们的洋牌子文化一并卷土重来，分享压榨劳动者的血肉盛宴；毒品、卖淫、赌博、黑帮也来了，与旧社会不同，现在的它们简直是一条条拉动经济增长率的产业链；经济结构畸形发展，高失业率与人力资源匮乏并存，最后陷入低迷不能自拔；越来越多的人不务正业，痴迷于彩票、股市或是理财产品；大块田地荒芜，农民为了维持生计进城打工，结果因为岗位饱和，所获的工资极低，农村迟迟得不到发展，放眼全国也是一样，市场调节下的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地让地域间产生天壤之别，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深化”“改革”！官僚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经济寡头，不须惧怕社会的谴责，也不会一边贪污私分一边胆战心惊；私企业主、富农也跻身一方新贵，这是他们为主子效力应得的；至于人民，除了“阵痛”，一无所有！^[8]

我想再次强调一遍：**历史上所实践的计划经济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前提。**台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们吹嘘治下的成就：改革有多全面、GDP 多少多少、吸引投资多少多少、建了什么大项目、和外国签了什么合同、世界排名排老几、人民生活有多丰富多自由……在此之前，他们必然又是数落一通计划经济的罪状：行政指令、官僚腐败、干涉经济、“大锅饭养懒汉”、封闭僵化、效率低下……讽刺的是，改革大潮后，国民经济的公有制成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变好而是变糟，贪腐问题不是好转而是恶化，无产阶级的权利不是被发扬而是被剥夺，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人民生活不是更轻松而是更痛苦。现在我倒要斗胆请教：改革，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是经济建设吗？就算是一把麦种，随手往地里一抛，

也总能长出几株穗子来，修正主义官僚把经济发展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却把过错打包给计划经济——立计划经济为改革的靶子，然后让计划经济背改革的黑锅，原来他们是这样解决计划经济的弊病的。从翘起嘴皮的一刹那，他们所谈论的就不是“怎么做蛋糕”，而是“怎么分蛋糕”，换言之，**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只能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关乎利益归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归属于资产阶级。

可是，为什么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普遍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当今世界？是因为人性贪婪自私？都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或许你已经留意到，我在向你描述计划经济时，曾提到过“企业”“商品”“工资”“脱产人员”这类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纯粹的一反了之，它在婴儿时期保留了许多旧社会的特征，包括商品制度、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工资制度以及围绕前二者建立的货币制度和干部制度**，这条“资本主义尾巴”是那么的刺眼，以至于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0]除此之外，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100%的公有制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仍存在一小部分私营经济，因为目前的公有制经济尚不具备及时生产、及时流通的条件；有的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业和农业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国家这个“大集体”，是按地域和生产单位划分的

“小集体”。马克思将这些处于社会主义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关系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绝非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的那样，证明“苏联模式”是变相的资本主义（就如我之前说的），**它是生产力不发达和旧思想残余的必然产物，不因任何意志而消灭**。囿于不发达的生产力，社会需要鼓励劳动和科技研发，就需要按劳分配；产品/生产资料无法无偿、精确、直接地分配给消费者/生产部门，只能继续沿用货币流通，于是便有了商品制度、货币制度和等级工资制；生产管理、分配产品、研发技术和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组织专门人员，这就离不开干部队伍。法权（Recht），顾名思义，是一种合法的权利，**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里似乎很平等，却孕育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听起来已经再美好不过了，问题是在特定方面人的天赋能力不一样，经济负担也不一样，长此以往总会有人丰裕有人紧迫，这与“共同富裕”相悖。奖金、津贴等物质刺激，一方面确实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但也给劳动者的双眼蒙了一层纱，使他们只计较自己的那点利益，像对待资本家那样敷衍现在的工作，忘记了集体的利益，忘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干部代行人民的权力而缺乏制约，就容易瞒着人民滥用职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充当为资本主义开路的急先锋。对于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列宁曾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小生产者有了既得的经济基础，必然会想方设法扩大这种经济基础，敌视与之对立的公有制经济，他们是复辟的主力军。即便是同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实际运行起来也很成问题。集体农庄/公社和集体企业不比国营农场、国营企业，国家不能

任意调配它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们通常独立于国营经济而自负盈亏，既然如此，单个集体经济单位就与国营经济和其他集体经济单位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单位的劳动成员的思想自然也游离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因为算小集体的小账而忘了大集体的大账，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但凡明智的共产党人，都会坚持不懈地探索将集体经济改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道路，以缩减、消灭这种大、小集体间的对立，而非相反。

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法权的辩证关系在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却在无时不刻反噬新生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国家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就是在其统治下两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斗争史，斗争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更加优越的计划经济，要么直接倒退回市场经济。**共产党人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在反动派的地盘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走资派同样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在社会主义国家上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权，所以表面上看，修正主义一开始只是在原有社会主义制度上扩大了什么、缩小了什么，但正是只需要这类些微改动，就能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滋生提供温床，魔术般变外观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取决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此前能做的只有借助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说白了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许多朋友一听见“政治”，便想到“上纲上线”，便想到“争权夺利”，便想到“红像章”“语录歌”“忠字舞”，想到“批斗”“武斗”“喷气式”“高

帽子”，进而想到“十年浩劫”“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便跳起来大呼“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要不得！”其实政治又哪是什么洪水猛兽呢？就说你们右派言必称之的古希腊，那时哲人对政治的定义就是“一门管理城邦的技艺”，打理公民日常生活，这就是政治最初的含义。民法学上有一对概念叫“公行政”“私行政”，前者是指国家或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后者则是像企业这样的私人组织对自我内部事务的管理。有常识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两者的天壤之别：今天西方国家常常标榜本国政治是民主的，每个公民都享有民主权利，可以质疑甚至调侃政府；但它们的私行政则截然相反，企业私行政几乎完全是由企业的所有者说了算，不受其他外力干涉，尽管法律做出过某些方面的限制，企业主依然是手抓工人的生杀大权。有人形象地把大老板们比喻为封建主，在自己的封邑——企业里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今天叫你们互扇耳光，明天叫你们学狗爬。企业离开工人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但是工人，他们从未因为对企业的贡献而取得相应的企业民主管理权，今天的社会，工人的地位可能还比不上厂里的一颗螺丝钉。而企业主，他们又凭什么垄断了章程设立和企业管理呢？他们有的，仅仅是一个“有”字，然后雇佣一群公、私家丁去捍卫这个字眼罢了——资产阶级已然是经济生产上的多余人，却正是这些多余人在统治着一切。这种奴役性质的生产关系下，生活在“民主”社会下的人们又会比封建时代好到哪里去呢？那些自由主义的大学者们，又怎能大言不惭地宣称“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可见，经济的领导权本身就是政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于后者的反抗而存在。生产社会化，这意味着经济应该扩展为

由全体劳动者参与治理的社会事务，而非少数人的门户私计，共产党人所做的，不过是匡正这荒诞扭曲的生产关系，剥夺“多余人”的经济领导权，实现劳动阶级的经济民主化。

这个任务是长期艰巨的，它不会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自行完成，也就是说，不是将“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写入宪法就万事大吉的。*“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12]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从苏联和本国的历史实践中认识到，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和机关还是沿用旧式的“一长制”，那么工人享有的权利再多，也是没有保证的，因为群众处于事实上的失权状态——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毛泽东整个后半生致力于“政治挂帅”的实践，力图保证工人始终稳抓历史的主导权：经济上，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13]；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修正主义势力，启用新人，主张无产阶级的“四大自由”^[14]，领导工农群众同资产阶级法权作斗争。尽管这些实践均以失败告终，但仍不失为伟大：实践向我们揭示，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并不是取消派叫嚣的那样，只能坐以待毙，修正主义利用政治进攻我们，我们就还以政治，自觉运用专政武器，努力克服资产阶级法权，这为革命后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提供了一条宝贵思路。

“人人天赋上的差距，怎么可能平等呢？”

这句话比前面的格局都大太多了，不过我想要是在这里坐而论道的话，一定会惹你反感吧，我们就从贴近生活的东西说起，还是 iPhone 怎么样？我们知道，2007 年发行的 iPhone1 绝对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创举：当时谁又能想到，手机可以没有手机盖，没有繁琐的键盘，可以像掌上电脑一样供我们一玩一整天？iPhone 的设计者史蒂夫·乔布斯同样是一位卓尔不群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设计了许多独具匠心的电子产品，更在于作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从不像别的企业家那样，一头扎进市场需求分析里不能自拔，他只做自己想做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颠覆性影响，它们受人追捧，令人为之疯狂：Mac 机、iPhone、iPad、App Store.....乔布斯曾引用一句亨利·福特说过的话：

“如果我最初是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 ^[15] “需求决定供给”，这条经济学原理在乔布斯身上看起来并不适用——他从来都是在创造需求。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崇拜乔布斯，尊他为不世出的伟大天才，把他与哥伦牛顿比肩，说他目光超前，敢做常人想不到的事情，一个人就能掀起改变世界的革命，而且还不止一次。

乔布斯的例子似乎证明了“超人”与“群氓”间的差距，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乔布斯的天赋真的如人们想的那样遥不可及吗？

要知道早在福特之前，汽车的动力系统、发动系统、轮胎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而且早在福特之前的 1886 年，卡尔·本茨就发明了汽车。对曾经是一名工程师的福特而言，能看出未来汽车取代马车的趋势，并

不是一件难事，更何况他在成立福特汽车公司前也曾有过两次失败的创业经历。乔布斯也一样，许多人说在乔布斯身边的一群猪队友，1985年他们把乔布斯赶出苹果，之后把公司弄得一团糟，最后不得不重新请乔布斯出山。可我们何尝不能说，正是因为当年董事会给乔布斯泼了一盆冷水，才促使日后重掌苹果的乔布斯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呢？更重要的是，苹果这个庞大的企业本身就是乔布斯的根基，iPhone 被推出时，苹果公司已经是一家市值 734 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在长达 31 年的历史里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苹果公司也从这一次次成功或失败当中不断调整自身。虽然乔布斯离开苹果的那段时间里也创立了 NeXT 和皮克斯，但很显然只有苹果才能为他提供大量的试错机会，有的小企业也不乏创意，可由于没有资金支撑他们的创意，只能潦草收场甚至破产倒闭。所以说天赋不是万能的，如果当年创业期乔布斯再多经历几次挫折，资金再不到位，还会有今天的苹果帝国吗？我想是不会的。

“成功学家”们整天拎着你我的耳朵，在你我面前嘶吼：“为什么你成为不了乔布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句屁话。在今天这样一个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单个普通工人再难窥探一项生产技术的全貌，他被固定在流水线的一个位置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劳动，千万种简单、局部的劳动被资本统一为一整套生产流程，也就是说，生产技术牢牢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手中，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对产品改进、研发。与其说“你我成了打工族，乔布斯成了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打工族成了你我，企业家成了乔布斯”。所以，被你们右

派供奉为祖宗的亚当·斯密说“人们具有的天赋资质各有不同，不过实际差异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壮年时期，人们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的各异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6]

天赋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不假，但更多时候我们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归结为天赋，只是那些大人物的虚荣心使他们不肯承认与其他人再有任何相似之处罢了。



你说人人的天赋不平等，但你似乎忽略了，人人的先天条件更不平等。如果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除了接受义务教育，他还可以请家教、报补习班，有条件购买优质的教材和学习工具，有更多门路去选择一个好大学，就算他学习不理想，还可以出国留学，回国后依旧可以找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他和富家子弟已经不是零比若干的问题了，经济拮据使得他父母连同他自己变得“愚昧”，学习技巧上落后于人不说，有时为帮父母补贴家计还要打零工，这就大

大挤占了学习的精力，即便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往往因为无法负担高额学费而被迫辍学，终究难免踏上父母的老路。人们常说教育是抑制阶级固化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看来这道防线无疑是十分脆弱的，巨大的先天鸿沟击碎了无数渴望咸鱼翻身的幻想，鸿沟不局限于教育，它无处不在，日益明显，可人们觉得那是天经地义，在因果颠倒的秩序下循规蹈矩并承受这个秩序回报给自己的苦难。

德行不也是如此吗？公共媒体和意见领袖们一面“又在吹嘘丰田、松下如何节俭，赞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付小账一分也不多给”，一面又嘲笑省吃俭用、把钱存进银行的平头百姓，说他们吝啬、保守、是劳碌命，“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他们炮制出一个成语来粉饰显贵的残暴不仁：杀伐果断，又同样用另一个词攻击那些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人：穷山恶水出刁民。何谓秩序，秩序就是美化一切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无论它对于被统治阶级多么恶劣、多么残酷；秩序就是丑化一切有害于统治阶级的，无论它对于被统治阶级多么高尚、多么美好——自私有制以来就没有改变过。

然而，你说“再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

现在，恕我冒昧地为你画一幅肖像画：对政治不甚关心，至少不去主动了解，也抵制任何政治干预；靠个人感受去判断问题；推崇现有秩序与等级。这幅肖像画画的不是官员、企业家或是其他名流人士，因为这些人恰恰最关心“天下大事”，不信去听听他们的演讲，开口便是“国家”“未来”“共产主义”；也不会是底层工人，劳苦大众从不考虑“谁

为高福利买单”这种问题。这幅画的主角往往有一个相对充裕的经济条件去满足他的消费爱好，但他也因此为纳税而烦恼——是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市民。

这并不是在扣帽子，市民阶层在历史上曾起到过革命作用，法国大革命就是它的杰作。当年巴黎市民用自己的双手双脚攻克了巴士底狱，令庞大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臣服；之后，市民们用双手双脚击退了英国、普鲁士、西班牙等国的侵略军，击退了这些“强调稳定增长”国家的反法同盟；又过了几年，法国人再一次用双手双脚征服了欧洲，将“自由、博爱、平等”传播至世界各地。拿雅各宾专政、“九月大屠杀”否定法国大革命，历史上从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不能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从财政亏空、上层腐败，到一扫积弊、所向披靡，这不过是革命后20年内所发生的事情。**革命，她所展现的，难道不是人民扭转乾坤的天赋吗？难道不是人民亲手重塑的秩序吗？**反动派还没倒台时，竭力镇压一切反抗，于是施暴、强取豪夺以及他们的绞刑架、断头台便成了秩序；一旦革命者把王冠打落在地，粉碎一次次反攻倒算，他们就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倒控诉起革命、没收财产以及革命者的绞刑架、断头台是一场血腥的灾难了。是啊，等到群众冲进贵族老爷们老巢的时候，除了往日欺男霸女的天赋，那群寄生虫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天赋呢？



© Dodd, Mead & Company, Inc.

THE BAND INCREASED AT EVERY MOMENT

啊！您说出来啦！九三年！我就等着这个词呢。一千五百年来，乌云密布，十五个世纪后，乌云劈散，而您却在指责雷霆！——雨果《悲惨世界》

可见，秩序并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从中获益的人认可它、维护它，而受到压迫的人反对它、想要推翻它，重如泰山还是一文不值，完全取决于秩序给那个人带来了什么。

放下春秋大义，让我们回到你评论的前半段。正如最开始所说的，你在用感性体验来做判断，而这是社会上极为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说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强，因为后三十年有什么什么，前三十年没有什么什么，至此就不再做进一步分析了。前些日子看到这样一对图片，第一幅画的是一条大马路，马路上是一群穿着中山装、65式，骑老式自行车的人——一看就是改开前；另一幅同样是一条马路，上面则挤满了小轿车——很明显是改开后了。按照某人的说法，“贫穷是万恶之源”，既然过去人们只能骑简陋、便宜的自行车，现在却能开高级、昂贵的小轿车，那自然是天上地下，是“梦都连接不起来的不同世界”了。这种人既不去探索表象背后的东西，也拒绝用发展、联系的眼光看问题，并且，正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是在用一种事物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事物。小轿车最根本的用途是什么？提供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这个毫无疑问。如果你有一辆小轿车，可能你经常会遇到这件事：堵车，堵车这种城市病，从二环堵到三环、从上午八点堵到十点，都不是没可能，开轿车原本是为了出行方便，可许多有车族被堵车耽误了正事，要是开汽车还没骑自行车快，那汽车又比自行车优越在哪儿呢？舒适？上档次？我们现在来算一笔账。现在一辆像样点的汽车一般要几十万，一般人是无法现款购车的，他们通常是借车贷，然后连本带息地分期付款，有个词叫“车奴”，形容的就是那些为还车贷而缩衣节食的可怜人。车贷还只是短痛，

起伏不定的油价才是长痛，有车意味着人不得不为汽油支付一笔额外的日常开支。除去车贷和油钱，有车族还要定期维修，购买各类车险，还可能还要缴纳罚金……这么多的费用哪里是在用车，完全是在养一个孩子嘛！汽车商、经销商，那些把汽车捧上天的人，那些鼓动你买车的人，从来不见他们会考虑你的交通和经济问题。在那个“贫穷”的以前，马路上自行车和公交车居多的时候，人们的工作单位基本就在住处附近，不需要长途跋涉；如果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坐公交就行，一辆公交车搭载几十个人，便捷程度固然不能和私家车比，但也因此鲜有交通堵塞发生，马路宽阔干净，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一个将生产资料收为公有的社会，它的人民的生活必然也会公共化，这种大前提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产品理念与资本主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通常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公交汽车、出租车的普及程度，要高于私人小轿车。公共交通自身有缺点，这我不否认，但这些缺点是完全可以用物质和技术投入来弥补，比如改善硬件设施、灵活设置站点和班次。实际上现在政府就能够做到这些，如果真是那样，今天的交通应该不会太拥挤，我们也用不着为了一点脸面去承受高昂的经济负担。只不过，假如政府真的付诸实施，那些靠卖私家车发家的汽车商、经销商会高兴吗？

同理，如果说 iPhone 最开始风靡全球在于它超前的设计和卓越的性能，那又如何解释“刚给你买了 iPhone5 你就要 5s，看别人有了 iPhone6 你又要 plus”这种现象呢？iPhone 系列每半年推出一款，有无数人很短时间就换一部手机，甚至有人故意把手机弄坏，好去换最新款的 iPhone。买 iPhone 就是买时髦、买面子，跟手机本身有什么功

能没太大关系，就算没有 iPhone，企业家们照样可以通过包装、宣传其他商品来掏空你的钱包，不过手法或许没乔布斯的 iPhone 那么高明、那么有诚意是了。小市民们反对社会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下的商品没有资本主义多、没有资本主义丰富、没有资本主义品质好，他们用自以为理性客观的语气陈述这条理由，殊不知他们对商品本身就秉持一种反智的态度，不顾自身的消费能力，把工资投进华而不实的商品里，尽管商人们很乐见于此。小汽车和智能手机怎能被当做衡量两种制度的标杆呢？

我们所说的“小市民”“市民阶层”，是基于商品经济而产生的社会群体，商品经济对于他们的恩情尤甚于他们的父母。当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封建专制阻碍商品经济发展，他们便会挺身而出推翻旧秩序，此时他们身上闪耀着种种美德：脚踏实地的生活观念、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浪漫的气质……只因为他们所捍卫的经济基础是进步的。

然而，一旦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资本主义在世界广泛确立起来，市民阶层的种种美德便会迅速腐败：脚踏实地腐败为市井习气、追求美好腐败为自私自利、浪漫腐败为肤浅。商品经济不再作为摧毁封建桎梏的终极武器存在，它以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的幸福为养料来给自己延命，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更是如此。正如资产阶级需要雇人为其生产商品，他们也需要雇人为其消费商品，维护其统治根基，避免更大的危机。小市民，或者干脆挑明了，小资产阶级，无疑是最能胜任

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不会跳出资本主义来思考问题，因为后者恰恰是他们割不断的脐带，他们就是这样在消费主义的圈舍里，被资本家用名为商品的饲料喂食，并理所当然地沉浸在“顾客就是上帝”的自我幻想中。

你支持市场经济，你在支持一个不知道会给你带来什么的经济。你反对左派，你在反对一个你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群体。你说：“再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 **这不过是在用一个奴役你、驯化你的思想，去反对一个试图解放你的思想！**

这也不是任何指责，因为正确的思想不是从脑子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工人阶级也一样。“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7]然而工人阶级的觉醒不仅仅是“有教养的人”灌输的结果，工人起初头脑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听闻的、所遭受的，无不契合马克思主义，清楚自己处于何等地位，这推动着工人阶级拥抱马克思主义。反观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也受压迫，但基于“总有人比我惨”的心理，得过且过，无论他们接受多么高等的教育，没有认清自己的处境，终究会支持不利于自身的主张，做出不利于自身的蠢事。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大概就是如此吧。

柏拉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洞喻”，把接触真相前的人们比作一群一直囚禁在洞穴里的人，习惯了在黑暗中生活，把光投射的影子当做真

实，但他们害怕光会弄瞎他们的眼睛。直到有一天，有个人被解除枷锁，走出洞穴外，经过短暂的刺痛后，他的眼睛看到了湛蓝的天空、辽阔的大地，以及影子之后事物的本貌，从此以后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习惯于黑暗的状态了。我并不是很赞同柏拉图的思想，但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才愿意放下对光明的恐惧，下定决心迈出一步，去看看洞穴外的世界呢？

参考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9 页。

2^ 详见蓝军战情室“富士康每条产线每小时产 590 台新 iPhone：iPhone XR 优先”<https://zhuanlan.zhihu.com/p/44646438>

3^ 根据《劳动法》规定，延长工作时间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

4^ 即“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大改良之一。”

5^ 摘自《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http://www.fmprc.gov.cn/ce/ceus/chn/zt/zfbps/t951276.htm>

6^ 关于计划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可参见 b 站视频“蘇聯：社會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av30447690)，此外 1976 年由尤里斯·伊文思与玛塞琳·罗丽丹·伊文思执导的纪录片《愚公移山》第 4、第 7 集中的一些内容也反映了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

7^ 之所以是“外观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因为从资本主义国际经贸的角度去看，社会主义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它以赢利为目的，生产的商品不是劳动者自己使用，而是被用来实现交换价值。但是，只要国家还是无产阶级掌握，能由其意志决定商品的交换和之后的分配，就不能说“国家剥削工人”。以上只是商品输入输出，不涉及资本输入输出。

8^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可参见美国革命联盟著《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视频 可参见台湾宣鼓 TV 的《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9^ 《马恩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 页。原文主语为“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10^ 节选自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

11^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5 页。

12^ 出自 Zhang Chunqiao《On Exercising All-Round Dictatorship Over the bourgeoisie》。

13^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是鞍山钢铁公司探索出的一套管理制度，1960 年开始被倡导推广，并被命名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马钢宪法”（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

14^ 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种无产阶级民主权利，1975 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被废除。

15^ 《史蒂夫·乔布斯传》，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8 页。

16^ 《国富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17^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7 页。这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那个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而是真真正正的马克思主义。